

文章编号: 1671-718X(2002)04-0017-03

从利玛窦、徐光启看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之命运

彭彦芬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在西方文化近代化转型即将完成时期,中国也从明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其先行者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来自体系本身的巨大排拒力和阶级、时代的局限,终至明末主动、平等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行为如昙花一现,很快结束了。

关键词:利玛窦;徐光启;明末;西方文化;科技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

一个民族是否能在世界文化的冲击下站住脚,不在于画地为牢或全副武装地去排拒,而在于它是否能敞开心扉主动地、平等地、有目的地有区别地接纳、学习。我国古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很大关系,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世界化了。在封建社会末世,反其道而行之,将西方文化为我民族所用,尤其必要和难能可贵。最先从事这项工作的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

1 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利玛窦(Ricci, Matteo 1552—1610)意大利人,1571年加入耶稣会,以广播基督教精神于世界为己任,1582年8月,利玛窦由印度的果阿抵达澳门,取名利西泰,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活动。十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接近尾声,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运动不断高涨,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基本完成,在近代实验科学和人文思想冲击下,天主教统治出现严重危机。为此,耶稣会决定把基督教世界主义的精神推广到遥远的东方,希图在地广人稠的中华帝国重建基督教昔日的荣耀。

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基础上,一些手工业部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其中江南丝织业、棉织业中相当突出。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革,表现在思想上是产生了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对科技的要求更显急迫;另一方面,政治腐败没落,倭寇骚扰加剧,满族觊觎关内,封建负担加重,阶级矛盾尖锐,明王朝面临全面危机。正是在这时,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他的“实心、实行、实学”^[1]对明末实学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利玛窦的耶稣会团体是以布教的创新精神闻名于西方的,其成员都以在新世界

里从事科学和长途旅行而著称。但,利玛窦来华前,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失败了。为此,耶稣会改弦更张,制定了一种传播福音的新方法,就是强调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仅仅采用中国人的“服装,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在一个欧洲人的可能范围内竭力将自己造成中国人的做法是不够的。”^[2]“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3]这正是1582年利玛窦来华后采取的具体布教策略,士大夫徐光启正是他选择的对象。正如《明史》所载:“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利禄。利其所著述,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4]教会史家赖德烈(Latourette)也说:“这一争取统治阶级友谊的努力,是符合耶稣会创始人所制定的政策。”在中国,这项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和成功的。基督教宣言爱上帝、爱人如己,与沿袭了两千年的儒学传统伦理道德正好合拍。于是一些贫苦的百姓开始到利西泰那里追寻快乐的“天堂”,徐光启则去寻儒学之根。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始相晤,聆利氏言论,”“为低回久之,”“以为海内通达君子。”^[5]1603年,徐光启因事返回南京,品读了利玛窦的《天主要教》和《天主实义》,在离开南京时受洗,教名保禄。

徐光启(1562—1633)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字子先,号玄扈,“少小游学,行径万里,随事咨询,颇有本末,”^[6]这种经历与他以后学习西方科学不无关系。1604年,42岁的徐光启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此时的徐光启不仅熟谙中国的古典科学和学术思想,而且世界观业已形成,对于如何对待和适当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有较成熟的见地。在与利氏的交往中,他认识到利玛窦不仅是传教士,而且是科学家。利氏讲求科学试验,社会实践和实际应用,又有着卓越的、先进的、广博的,甚至是奇妙的科学素养,对徐光启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再合适不过了。徐光启认为,成为基督徒以亲近利玛窦,是学习其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科技文化的最好方式。当务之急须从“根本之计”做起,即“务农贵粟”,要解决宗禄问题、漕河水利问题和盐策、屯田、边饷、器胜等问题,就必须解决科技上的许多问题,换言之,必须以“度数为之宗”;而“象数之学”正是利玛窦在华传教的工具。这样,徐、利二人从不同的意图出发,找到了共通的窗口。

收稿日期: 2002-09-27.

作者简介: 彭彦芬(1966-),女,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师。

2 徐、利交往及其文化传播的情况

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科学家对中国古典科学总结时期,这给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此,徐光启后半生几乎全部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结合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中西文化“会通”而为一,最后“旁通十事”,实现“超胜”西方文化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从利玛窦处翻译了西洋科学书籍,亲自设置试验需要的各种简略仪器,进行科学试验,观察总结。徐光启最早的译著是《几何原本》,作者克拉维斯是利玛窦的数学老师,伽利略的好友,有“十六世纪的欧几里德”^[1]之称。徐光启首选该书也因为“汉以来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地,虚发无效,或依倣形似,如持荧烛象,得首失尾,”而“《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2]1607年,随着《几何原本》前六卷在中国的出版,欧洲近代数学被介绍到中国,并为中国近代数学名词的使用奠定了基础,如:《几何》里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斜方形等,都由此在中国使用并确定下来。译著的付梓却使徐光启喜忧参半,“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急需,余译竟,虽协同好者梓传之,利先生作叙,亦喜其传也,意皆欲公诸人人,会当世亟习焉。而习者盖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3]作为明末科学技术的泰斗,徐光启昭示了中国近代科学道路上的几多辛酸和坎坷。

徐光启对数学的重视使他在学习西方象数之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翻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诸义》等,介绍了西方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引进了许多新的公式,并将中国现有的测量法与西法比较,叙述两者的异同。三角函数也是徐光启等人首次介绍到中国的,当时称《测圆八角线》。然而,徐、利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600年二人初识后,1601年,利西泰即入京建天主教堂,至1604年徐光启进士及第进京为官,徐光启才从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军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4]1607年徐光启又因父去世,离京回沪,1610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再次相见后不久,利玛窦长逝于北京,前后加在一起不过五年,而且二人合作的译著并不多,但自二人相识起,徐光启就有意识地师法利氏,学习西方文化,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明末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之先河,以至于“富国强兵”成为整个明末有识之士和先进的儒家士大夫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例如,1612年,徐光启与熊三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六卷,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水利知识。“水法一事,亦属象数之流”,“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它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量之事,无不赖以有用,用之无不尽巧奇妙。”^[5]还因为“昔与利先生游”,“辄为余说其大旨,悉皆意外奇妙,了非筹措所及。”从这方面讲,《泰西水法》及以后的许多译著堪称徐、利合作的精神产物。1629年,68岁的徐光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管部事,6月21日日食,钦天监失推,这就为他提供了很好的修历机会。当时使用的历法是元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而《大统历》“自至元十八年成历,越十八年为德

三年八月,已推当食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6]所以,徐光启决定参用西法,制定新历,因为“至若岁差环转,岁时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似会,皆古来所未闻,唯西国之历有之。”^[7]所以,“以大统历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功倍矣。”^[8]在翻译历书修订历法过程中,他从不轻信西洋的观测资料和天文数据,在制造天文仪器的规划上也够得上博大精深,他尊重客观实验,只要遇到日食月食,他必先布算,亲到观象台观察候验。1630年12月30日“前往观台再备细行考验计划,不意偶然失足,颠坠台下,致伤腰膝,不能动履。”^[9]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两年,在继任督修李天经的主持下,终于整理完成了《崇祯历书》130卷的鸿篇巨著,成为我国历法史上重要改革之一,奠定了我国近代历法的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格里高利历法阴历就是这次修订的。而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10]，“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于草屣束而已。”^[11]这是一位真正科学家的清贫和富有。

3 明末西方文化在中国之命运

在徐光启的努力和支持下,一系列译著得以在沉闷而闭塞的封建末世出版,西方文化第一次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在科技界、思想界引起反响,开阔了明末知识分子的眼界,给失去生机和活力的封建文化补充了新鲜血液,使之在清初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可是,徐光启的做法并不是当时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相反,每一步都遇到阻碍和反对。面对种种新奇的事物,中国的知识界,有人理解,有人反对,甚至诬蔑。在这背后,潜藏的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和排斥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和守旧,这无形中造成了徐光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巨大阻力。然而,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徐光启,怀着会通中西文化以挽救明王朝危机的强烈愿望并未实现。明王朝行将结束,富国强兵之策已嫌太缓,封建的中国却未走完他的全部历程,当时在江南地区出现的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足以形成对封建经济的否定力量。徐光启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有意识地将中国带上一条走向近代化的道路。随着明王朝的结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康熙虽能使徐光启的在天之灵稍得慰藉,但终因雍正时期的礼仪之争中落了,中国主动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行为如昙花一现,传统文化在得到一些滋补后,又回到了经学考据的故纸堆中,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那么,文化的传入者利玛窦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意义的文化呢?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是进步的,但对比欧洲而言,他带来的文化并非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作为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论证天主教义,达到“合儒”、“融儒”、“超儒”才是其最终目的。所以,利玛窦不可能做出任何不利于神权统治的事情。尽管在科学家布鲁诺、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顿等科学家面前,教会默认并接受了文艺复兴的一些学说,但包括利玛窦的后继者在内,他们的学术思想仍是保守的,他们对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和牛顿的科学理论几乎没有介绍。可见,在以传教为目的授之以科学之名的前提下,中国得到的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东西微乎其微,其生命力也大打折扣。如《几何

原本》前六卷译完后，“徐保禄还要继续欧氏其余部分，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六卷就足够了”。^[18]然而，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来华，不管他们努力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将西方宗教文化，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中国化了。利玛窦将“上帝”换成中国人能接受的“上天”，同时“就像他的装束一样，他的谈话和动作也变得时髦了，以至于除了他的社会和文化活动而外，很少有机会触及宗教问题。……他把宗教排除在谈话之外”。西方科技的中国化就更明显了，以徐光启为代表，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处处强调“补儒”与“会通”，同时注意学习法，反其道而行之，“参用西法”，“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励精图治，希望中国“人人真能自绣鸳鸯”^[19]。所以，要结识有学识、有才华、温文尔雅而又大福大贵的儒家官僚士大夫，不穿儒服、戴儒帽，采用中国的礼节，处处谨小慎微，那是绝对不可能与之平起平坐的。为了真正了解士大夫们的心理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利玛窦自1582年来澳门学习汉语，十年如一日。他诵读中国书籍，六经子史无不通晓，他熟谙各种风俗礼节，了解中国人原有的宗教信仰，对儒家的祀祖祭天表示容纳，认识到“儒教不仅是中国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20]所以利玛窦表现得极为尊崇孔子学说，处处以儒士身份出现，以科学家自居，甚至死后“装入一个密封棺材里的利玛窦神父的遗体就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停放在教堂里了”。^[21]利玛窦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第一人，他的中国札记后由金尼阁带往欧洲，他也是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的第一人。

沿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系统的。明末，面对西方文化，她以强大的蕴涵力吸收了来自那个神统世界的科学文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使当时有识之士深感中国的落后，并奋起学习，希望能迎头赶上。不管徐光启及其译著的命运如何，追本溯源，在回顾中国科学近代化转型的坎坷道路时，徐光启和利玛窦总是站在这条道路起点上的两尊永恒的雕像。

参 考 文 献

- [1] [8] [9] [11] [12] 徐光启. 徐光启集·泰西水法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 [21]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 费赖之. 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中译本)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 [4] 张庭玉. 明史·卷 326 意大利传 [M]. 长沙: 湖北崇文书局, 光绪三年三月.
 [5] 徐光启. 徐光启集·跋二十五言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6] 徐光启. 农政全书·卷 38.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校勘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7] [19] [21]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转引自汾屠立: 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 (上册), 乔尔捷提版, 马撒拉塔, 1913.
 [10] 张庭玉. 明史·徐光启传 [M]. 长沙: 湖北崇文书局, 光绪三年三月.
 [13] 徐光启. 徐光启集·礼部为日食刻数不对请敕部修改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4] 徐光启. 徐光启集·礼部为奉旨修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5] 徐光启. 徐光启集·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6] 徐光启. 徐光启集·因病在申前请以完大典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8] 查继佐. 罪惟录·徐光启传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20] 徐光启. 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The Fate of the Western Culture in China through Ricci Matteo and Xu Guang-qi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PENG Yan-fen

(Baoding Teacher's College,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transform of western modern culture was to be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China began to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as well. The pioneers were Ricci, Matteo, a missionary, Xu Guang-qi, a Confucian. They both made great accomplishment. At the end of the feudal society, however, the positive actions of absorbing western culture came to an end soon just as a result of the rejection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lass and times.

Key words: the western culture; Ming Dynasty; Ricci, Matteo; Xu Guang-qi; science